

# 徘徊中前进时期党对改革开放的理论探讨

● 王永凤

[摘要] 徘徊中前进时期,党的改革理论开始酝酿,开放理论初见端倪。党对改革开放系列理论的探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了重要准备,也为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

[关键词] 徘徊中前进时期;改革开放;理论探讨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1)11-0009-03

所谓“徘徊中前进时期”,是指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两年多的时间。许多人谈论改革开放时往往仅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说起。但事实上,徘徊中前进时期我们党已经对改革开放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讨,并取得了重要成果。正如邓小平所说:“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sup>[1]</sup>可以说,徘徊中前进时期党对改革开放的理论探讨,为三中全会开辟改革开放新时期做了重要准备,也为后来中国特色改革开放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铺垫。

## 一、批评旧的僵化体制,改革理论开始酝酿

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党在“徘徊中前进时期”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必要性、重要性、改革的思路 and 措施进行了不懈的理论探索,其主要观点有:

第一,苏联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可以有多种模式。经过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照搬苏联模式的危害,我们党的认识比以往更为深刻。1977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籍华人作家韩素音时说:“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sup>[2]</sup>1978年6月,在听取《中国共产党党的工作者访问团对南斯拉夫考察的报告》后,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可以有多种模式,任何国家都不应该盲目照搬别的国家,但对他的经验应该很好地研究。9月15日,邓小平再次痛斥苏联模式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等弊端。<sup>[3]</sup>其他领导人也提出过类似看法。党对苏联模

式的理性思考,为中国走出旧体制的泥潭做了深层的理论铺垫。

第二,改革事关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的前途。粉碎“四人帮”后,对历史的反思和敞开国门带来的冲击,使中国共产党人对改革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日益提高。1978年6月30日,华国锋在听取谷牧汇报后指出:“现在我们的上层建筑确实不适应,非改革不可。”<sup>[4]</sup>7月7日,他在全国家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又指出:“要有勇气正视和揭露我们的具体政策、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思想观念中那些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要求不相适应的东西,有魄力去坚决而又妥善地改革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sup>[5]</sup>9月18日,为推进人们对改革重要性的认识,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高度进行了阐述。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sup>[6]</sup>事实表明,如果社会主义带给人们的是普遍贫穷而不是共同富裕,这种制度迟早是要被否定的。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提醒人们: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第三,必须对现行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我国对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不是局部的、某些方面的,而是全方位的。对此,1978年9月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即有明确说法。他指出: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

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我们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改革一切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sup>[17]</sup>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上强调:“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sup>[18]</sup>可见,徘徊中前进时期,我们党对全方位改革问题已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

第四,对经济改革的具体办法进行了初步探索。其成果主要体现在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上胡乔木的长篇发言和李先念的总结报告中。会上,大家提出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决定问题;健全经济核算制,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坚决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等等。9月5日,国务院召开计划会议。会议提出经济战线必须实现“三个转变”重要思想,其中之一就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益、不讲工作效果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sup>[19]</sup>,从而将国务院务虚会所取得的成果转化成了中央的基本决策。

在改革思想取得一致的同时,具体的改革行动也在付诸实施。农业方面,1977年11月中共安徽省委制订的《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成为“文革”后全国出现的关于农业责任制的第一份红头文件。它使安徽省率先迈出了纠正农业“左”倾错误、落实农村政策的坚定步伐,并对后来安徽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中国农村改革开始最初突破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工业方面,197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财政部、一机部拟定的《关于一九七七年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的报告》。该报告集中部署了1977年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开启了“文革”后新一轮体制改革的序幕。此次改革虽然延续了行政性分权的思路,但在指导原则上真正回到了《论十大关系》上来,在注重行政性分权的同时,也适当注意财权物权的协调配置,注意运用价值规律的作用。受其影响,197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决定,在工业企业首先进行扩大自主权的改革尝试。从此,中国城市的企业改革逐步展开。

## 二、走出国门、对外学习,开放理论初见端倪

走出国门、对外学习,是徘徊中前进时期的突出特点。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访,为促进

对外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1978年,仅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就有12位先后21次出访,访问的国家达51个之多。出访活动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通过增强与发达国家和正在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交往,学习和借鉴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的建设经验。此外,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派出了众多考察团出国参观,并于1978年形成第一次出国考察热潮。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西欧五国考察团。这些考察团十分活跃,他们直接承担着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任务,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开放启动大局的需要。在这些开放实践中,我们党日益认识到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并在中国为什么要开放以及怎样开放等问题上,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第一,对外开放具有客观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叶剑英曾把出国考察比作“照镜子”,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是一面镜子,可用来照照自己是什么情况,没有比较不行。<sup>[10]</sup>邓小平则在1978年10月10日会见联邦德国新闻代表团时指出:“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sup>[11]</sup>与此同时,我们党逐步认识到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一方面,通过揭批“四人帮”和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全国人民的思想获得空前解放,这为对外开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另一方面,西方为摆脱战后严重的经济危机,有与中国进行交流的强烈愿望。据谷牧回忆,他在同法国巴尔总理会谈时,按事先的准备打算先谈政治,但巴尔总理却明确表示谈经济。法国德斯坦总统在会见他时,也说自己对经济感兴趣,问法国的东西哪些是中国需要的,法中两国可以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结果,根本没谈政治。在联邦德国访问时,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中方如愿意接受50亿美元,用不着谈判,现在握握手就算定了!<sup>[12]</sup>回顾建国后我们想同西方国家交往却屡遭排斥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扩大对外交流的绝好时机,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对外开放的信心。

第二,对外开放应是全方位的,要学习西方一切好的东西。首先,对外开放必须引进世界先进技术。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性,而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要学习他国的长处。邓小平的这一论述,使人们放下了思想包袱,为我们学习西方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条件。其次,对外开放必须引进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邓小平曾专门指示谷牧在西欧考察时,要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

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sup>[13]</sup>他认为,必须改变经济发展中人为因素过浓的状况,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去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sup>[14]</sup>可见,邓小平把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放在突出地位。再次,要重视引进国外优秀人才。1978年11月27日,国家科委、外交部在报请国务院《关于加强引进人才工作的请示报告》中指出:学习外国“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引进人才,也必须加以重视”<sup>[15]</sup>。报告认为在引进人才方面,我国政府必须采取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如成立国务院引进人才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组织有关方面的工作;将国务院外国专家局改为国务院专家局,以便统一管理和接待;对来我国短期工作或长期定居的科技人员,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应亲自抓好接待工作,并就生活待遇、保密工作等方面做出相应规定。

第三,取消两个“禁区”,利用外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在粉碎“四人帮”的很长时间内,我国在对外交流上仍然存在两个“禁区”:一是禁止外商在中国投资,二是禁止政府间贷款,只允许银行间的商业贷款。受其支配,我国不允许外国资本家来中国投资办厂,也不允许中外合资经营。1978年10月,邓小平在回答其对日本政府贷款给中国的态度时说:“我们还没有考虑,今后将研究这个问题。”<sup>[16]</sup>在这里,他虽未对所提问题作出明确的正面回答,但对外国贷款并没有拒绝之意,可视为中国政府准备取消两个“禁区”的政治信号。11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民社党访华团时,明确表示可以引进外资,可以接受日本政府的贷款。他说:“可以接受。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方式。我曾请教过土光敏夫会长,他说巨额贷款需要政府间来办。民间不能解决的,需要政府间解决。”<sup>[17]</sup>这里,邓小平关于我国外资新政策的表达明白无疑。12月15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外贸部长李强在香港向世界宣布取消两个“禁区”,这标志着中国利用外资政策的重大变化。从此,我国利用外资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四,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1977年3月,全国计划会议指出:实现现代化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但主要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中国无论何时也应以自力更生为基本立脚点。离开了自力更生这个立脚点,就不可能有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就不可能迅速赶上和超过世界的先进水平。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强调:“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当然必须依靠

我们自己努力,必须发展我们自己的创造,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sup>[18]</sup>同时,他强调: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我们不仅因为今天科学技术落后,需要努力向外国学习,即使我们的科学技术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习人家的长处。从而,辩证地处理了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关系问题。

第五,对外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1978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指出:“过去行之有效的东西,我们必须坚持,特别是根本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那是不能动摇的。”同时,他强调:“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益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sup>[19]</sup>从而清楚表明了我们学习西方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

总之,徘徊中前进时期,关于实施对外开放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思想已在全党达成共识。而在如何进行对外开放,如引进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经验、坚持自力更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等方面,我们党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最终作出对外开放的决策做了充分的理论铺垫。

#### 参考文献:

- [1][8][14][18][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2.136.150.91.133.
- [2][3][6][11][13]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210.378.384.398-399.305.
- [4]华国锋在听取和讨论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时的讲话[Z].1978-06-30.
- [5]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78-07-12.
- [7]李先念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31.
- [9]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431.
- [10]郭德宏.中国共产党的历程(第三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121.
- [12]谷牧.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酝酿与起步[J].党的文献,2009(1).
- [15]李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对外开放的酝酿和起步[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2).
- [16]李正华.中国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起步[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273.
- [17]邓小平副总理同佐佐木的谈话[N].参考消息,1978-11-26.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讲师。

■ 责任编辑:周奕韵